



核心阅读

当前，各种网络工具正深刻冲击着现代社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交流信息的既有模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但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 孙宝云 封化民

网络安全风险的独特之处

有网络的地方就存在网络安全风险。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互联网，即使是物理隔离的内网、涉密网也无法保证绝对安全。一个有趣的佐证是，2016年，美国国防部首次开展了“网络攻击五角大楼”的有奖竞赛，奖金15万美元。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1400人获准在五角大楼5个对外开放网站中寻找安全隐患。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从4月18日至5月12日，参赛者竟发现1189项薄弱点，其

网络安全风险的特点及应对

中138项被认定为“独特、有效”。

网络安全风险大多具有爆发性特征，且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差异性日益弱化，危害性日趋增强。以网络犯罪为例，与传统意义上的犯罪不同，大到针对国家，小到针对机关单位组织，小到针对单个网民，网络犯罪均以各种木马、病毒为武器，攻击手段和攻击成本并没有显著差别，造成的危害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控制网络、窃取信息、实施敲诈勒索等。例如，2017年5月12日，“勒索病毒”首先在英国爆发，两天内就席卷了150个国家，涵盖政府部门以及医院、教育、能源、通信、制造业等领域。

网络安全风险的源头日趋多元化。从已发生的网络攻击事件看，既有政府背景的网军，也有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黑客团体，还有很多单枪匹马的技术怪才。更让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有很多非专业人士，大多为年轻人，仅凭个人兴趣、借助网络的开源软件，也能靠自学变身黑客，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徐玉玉案”的黑客杜天禹只有18岁，最早爆出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黑客拉扎尔原本只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此外，部分黑客组织或者个人，也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善恶敌友来划界，如“匿名者”国际黑客组织，曾攻击过很多国家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网络，但是在2015年11

月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该组织正式声明，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战，并在后来打击IS网络恐怖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网络安全的风险性与网络工具的便捷性相生相伴、如影随形。在互联网时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呵护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全部，从支付、导航、外卖，到信息搜索、新闻浏览以及交友、聊天和游戏，让网民受益颇多。但与此同时，巨大的安全风险也蕴藏其中，因为这个超级小助手必须通过网络才能完成每一项任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轨迹也因此被网络永久记录下来，并随着网络存储能力和搜索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变得日益危险。如运用简单的数据关联、借助免费下载的软件，普通人就可以在互联网中查找到特定网民的真实姓名、住址、电话，还能查到他常去的地点及日常生活账单等，这不只意味着人类隐私的终结，也意味着网民未来行为的可预测化：美国东北大学跟踪研究了10万欧洲手机用户，得出的结论是，预测一个人在未来某时刻的地点位置，准确率竟高达93.6%，网络工具的便捷性正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

网络安全风险发生的最重要导火索是网民自身的安全意识淡薄而不是黑客的攻击。与传统犯罪不同，以网

络攻击为主的网络犯罪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是除非发现漏洞或密码被破解，这些攻击并不会立刻产生安全威胁。因此，除特殊情况外（例如遭受有组织的黑客攻击），导致网络安全风险发生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网民个人安全意识的淡薄和安全常识的匮乏。以希拉里的“邮件门”为例，按照规定，美国涉密人员严禁通过私人邮箱系统发送公务邮件，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原本只能在加密网络中通过公务邮箱收发公务邮件，虽然这样做不仅十分麻烦而且非常不方便。希拉里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家中建立了一个私人服务器，同时收发公务邮件，并为图省事一直用这个私人邮箱处理公务直至东窗事发。另一个错误是相信永久删除后就没人能找到被删除的邮件。希拉里在上交服务器前永久删除了33万封私人邮件，但不幸的是，这些邮件很快被黑客找到，并在推特上公开了这些信息的藏身之处，“维基揭秘”网站则在投票前公开了这些邮件。更让希拉里的竞选雪上加霜的是，其得力助手阿贝丁也缺乏网络安全常识，竟与丈夫共用同一台电脑。结果，其分居中的丈夫因丑闻被调查时，联邦调查局意外发现其电脑中存有阿贝丁与希拉里之间的涉密邮件，于是，才有了投票前FBI重启“邮件门”调查的离谱故事，导致

希拉里铩羽而归。可以说，缺乏网络安全意识与常识是希拉里总统梦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有效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明确网络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一要坚持完善立法与强化执法并重的理念，着力强化执法力度，创新执法机制，有效打击网络犯罪。二要坚持网络安全技术防范与宣传教育并重的理念，探索网络安全宣传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全面提升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三要坚持国际合作的理念，创新与国际社会的网络安全沟通机制与合作途径，同铸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积极推动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网络安全治理进程。一方面，要严格监管企业、社会组织履行法律规定的基本义务；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激励措施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积极承担网络安全风险的治理责任，尤其在重大网络安全应急事件发生时，更需要那些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网络安全企业主动出击。事实上，“勒索病毒”的蔓延之所以能迅速被遏制，就与很多互联网安全企业的主动出击密不可分。放眼未来，无论是在网络安全风险预

防，还是在网络安全事件应对方面，企业和相关社会组织均大有可为。

全面提升网民的网络安全常识。一要宣传网络安全的基本知识。例如手机、智能摄像头随时可能被远程控制，变身窃听、窃照工具；各种智能软件的免费使用均需要开启定位系统，而这也意味着你的日常生活被网络完整记录；删除和格式化处理的信息公开均可以被恢复、看似只有几位密友的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安全性可言等等。二要鼓励网民养成良好的上网及用网习惯。例如工作邮箱与私人邮件分离；不点击不明链接，高度警惕免费WiFi；日常工作中要遮蔽电脑摄像头等等。三要强化网民的加密意识和正确加密方法。信息加密如同给家门上锁，是每个网民都必须掌握的技能。设置密码有三忌：一忌密码设置过于简单，二忌所有信息加密使用同一密码，三忌将不同密码保存在计算机中等，密码设置的基本技巧是数字+字母10位以上。此外，不仅电子设备要设置开机密码，储存的重要文档、信息、图片等也需设置不同密码，在互联网传递信息时，更应该养成加密后再传递的好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个人隐私。

公共安全

影响网络舆论生态的四组关系

□ 张 磊

主次：事件与舆情

在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首先需要明晰的是事件与舆情的关系。影响一个事件网络舆情走向的首要因素就是事件本身。事件本身的性质、所造成的影响、所涉及的利益群体等因素，都决定着舆情的可能演变。

相对于事件，舆情只是公众对其认知、观念、情绪和反馈的总和。因此，在网络舆情管理上，事件处置是主，舆情处置为次。如果没有处置好事件而希望管理好舆情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将网络舆情管理中的主次关系落实到管理职能上，意味着事件处置是第一责任，舆情处置服务于事件处置，围绕着事件处置的目标而定。对于一级政府或一个部门而言，舆情处置的职能一般都在宣传部门。然而在现实中，有些地方由于对舆情管理主次关系认知不清，常常使得舆情处置与事件处置变成两张皮，宣传部门与事件管理的职能部门各管一摊、各说各话，其结果是口径不统一、公信力受损，新闻发言人往往被“架到火上烤”。

从主次关系出发，在网络舆情出现时，事件管理部门与舆情管理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在处置好事件的基础上，宣传部门做好媒体沟通、口径把握、发布会组织等，而对于事件处置过程等重要发布内容则需要事件管理的职能部门提供，在发布会召开时需要相关人员的参加，而非由宣传部门包揽。

内外：主体与客体

在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主体与客体是一对相对的、可转换的概念。一般情况下，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其管理的主体是较为容易界定的，但对客体管理者的认定却往往是不清晰的。网络舆论管理应当坚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即针对不同

当前，尽管网络舆论生态的概念并不统一，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界定、怎么界定，分析和探讨网络舆论生态都必须关注对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变化构成影响的各种因素。

类别的行为体进行具体地沟通。

在网络舆情事件中会出现不同的行为体，不同的行为体，其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也会不同，相应地，沟通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也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按照重要程度来排序，从当事人到普通公众，参与网络舆论的行为体总体上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一是事件直接影响者。事件直接影响者可谓突发事件中的受害方，其诉求较为明确，即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其行为方式有多种可能包括激进的。二是利益相关方。这一类行为体不属于事件当事人或者受害者，但是跟当事人存在某种联系，比如亲戚、朋友、同学、老乡等。相对于事件直接影响者，利益相关方在事件的舆情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存在分化现象，取决于个体的理性程度。理性的利益相关方有利于事件的平稳解决，他们通过事件当事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事件详细信息，对事件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相对能够较为理性地进行分析，帮助事件直接影响者提出合法合理的诉求。三是第三方推动者。第三方推动者是基于社会正义而向事件受害者提出的行为上或舆论上声援的群体。在诉求上，第三方推动者希望维护过程的正义性，即事件的过程要遵循基本的正义原则。四是大众传媒。包括网络传媒在内的大众传媒的诉求是保障公众知情权，行为方式是采访报道，让更多受众获悉信息，了解真相。五是围观者。对于绝大多数公众而言，在网络舆论中其实都是围观者。他们的诉求是希望社会和谐，不希望今天发生

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明天发生在自己身上。在行为方式上，广大网民所选择的方式是转发评论，让更多人知道事件，倒逼管理者更透明地回应事件，以期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上下：线上与线下

除了网络安全和网络谣言事件之外，网络舆情从本质上说是网民对线下发生的公共事件通过网络表达观点和情绪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线上与线下会形成观点和意见的互动，还可能发生情绪的相互感染。

从网络舆情产生和发展的一般机制来看，在一个网络舆情事件中，线上与线下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推动舆情升温是一个动态的、多次“刺激—反馈”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一是线下“供料”线上。由于几乎所有的网络舆情都存在着载体，即线下所发生的事件，因而对于该事件的爆料是引燃舆情的最初表现。在舆论关注不断扩大，舆情演变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线下关于事件进一步线索的内容提供，或者各界对于事件过程的持续披露，将不断为舆情的热度提供能量。二是线上倒逼线下。对于不同性质的事件，涉事主体面对舆情的心理和反应可能并不相同。对于多数涉事主体而言，都不希望发生负面舆情事件，不愿意因此而被被动地面对媒体，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而不得为之。在这种情况下，线上网络舆论的倒逼功能就变得具有积极意义，促使涉事主体不得不回应的同时，也让事件过程逐步清晰，并在长远上促进公共事件的信

息公开成为常态化。三是上下合力共推。一个公共事件一旦到了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的阶段，那么线上和线下将形成合力，共同将事件推向热度更高的阶段。在此过程中，线下的持续供料将被以抽象化、突出化、标签化、娱乐化等方式，从而将事件的舆情扩大化，甚至发生舆论次生灾害。

新旧：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

媒体是提高公共事件公众关注度和影响公众认知度的重要渠道。随着网络治理走向纵深，公共舆论场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媒体舆论场和网络媒体舆论场之间的“隔阂”基本被打通，两个舆论场走向一体化。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对于网络舆情的聚成作用日益趋于均衡。首先，在网络舆情信息首发上，虽然新媒体依然拥有着天然的便利，但传统媒体的信息获取能力正在强化，优势也日益凸显，其利用记者站系统和平台的信息获取功能与新媒体的自媒体功能形成了网络舆论信息源的互补。其次，在深层次信息挖掘方面，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着各自优势，亦形成互补。再次，在网络舆情信息发布形式上，新媒体即时性、碎片化发布网络舆论信息的功能仍然不变，传统媒体则是在搜集新媒体碎片化网络舆论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综合以及可能的深入调查，从而汇总起事件的网络舆论信息。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以及不同群体对于各类媒体的认同与使用各异，不同类型的媒体对于公共事件的介入、报道和影响程度发生了悄然变化，现今出现了新的格局，表现为：主流官媒遭遇“冰火两重天”，重要客户端成扩散加速器，市场化媒体深入助推热度，问答平台成为新的策源地，微博仍系公共讨论的主阵地。

管理视角

（上接1版）党的十六大则明确提出“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求全党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要求不断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并将“创新型”作为党的建设努力目标之一。这些清楚地表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40年来，我们党一直保持着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品质，始终不断地在探索加强自身建设途径和方法。

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从严管党治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基本要求

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品质不断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前发展，除了始终保持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状态外，更重要的是坚持从严管党治党的原则，永葆共产主义政党的纯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共产党政治的基本逻辑出发，求真务实，坚持思想建党工作的连续性、针对性、普及性，有效地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培元固本工作；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政治生活因此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由此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这些成就的取得及由此积

累的经验，对我们在新时代继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启迪价值。

第一，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度进行自我革命。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党员基本政治道德，是党之为党的基本条件。这就要求党员应该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按照党章、准则、党规要求参加党内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必须以高尚的政治情操要求自己，杜绝庸俗、市侩文化的影响。

第二，以思想建设的要求为基础进行自我革命。就党员而言，“共信不存，互信不生”。党之所以成其为党，之所以具有永续性，关键在共同的信念、信仰。就当下而言，全党要自觉地、认真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第三，从做实基层党建工作入手进行自我革命。党的坚强有力源于党的基层党建工作扎实。而基层党建工作又主要体现在抓党支部和党支部的日常工作上。就目前而言，其关键又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以保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从而克服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等现象。

第四，勇于自我革命的关键在“关键少数”。各级党员干部、领导干部、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处于党的各级岗位上的“关键少数”，能否自我革命关系到党的兴衰存亡。就当下而言，就是要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自觉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教育。

第五，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自我革命的武器。“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党组织政治生活庸俗化，出现了“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或者搞无原则的纠纷，或者发泄私愤等现象。这就大大削弱了这一武器的力量，使自我革命流于空转。要消除这些现象，关键在教育党员从党性原则的高度认识其重要价值，真正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落到实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